

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



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· 第二卷 ·
政治 · 外交 (下)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



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· 第二卷 ·

政治·外交（下）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第二卷

政治・外交（下）

北伐后蒋冯关系之探讨（1928～1930）

陈进金*

一 前言

1928 年底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，开启权力集中、国家统一的契机；可惜的是，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过程中，许多地方军人为了保存自身实力，纷纷加入国民革命的行列；他们虽然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，却仍是不折不扣的旧军阀队伍。有鉴于此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为了抑制地方军人势力的发展，使国家建设能步上轨道，曾特别指出：“我们中国内部，尤其是本党党员个个要能够明了主义，共同一致来拥护中央，服从中央的命令；个个武装同志能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力，奉还中央，完全由中央来统一财政、军政”。^①

北伐完成后，军政结束，进入训政时期，南京政府乃试图提升党权，推行党治，以消除北伐时期过度膨胀的军权与军人分治的局面。由军权过渡到党权再实行民权，是孙中山早年的设计，也是国民革命军革命的目标。《国民政府建国大纲》是孙中山建设国家的总纲领，其中“建设之程序”即分为军政、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。孙中山在《训政之解释》的演说中曾指出：

现在我不单是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政治，还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，所以叫做“训政”。这“训政”，好像就是帝制时代用的名词，但是与帝制实在绝不相同。须知共和国，皇帝就是人民，以五千年来被压作奴隶的人民，一旦抬他做起皇帝，定然是不会作的，所以我们革命党人

*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。

① 蒋中正：《北伐成功后最紧要的工作》，《革命文献》第 21 辑（合订本）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编印，1968，第 4128 页。

应该来教训他，如伊尹训太甲样。这个“训”字，就是从“伊训”上“训”字用得来的。^①

此处的“训政”可以说是建立“由上而下型”之民族国家所必经的过渡阶段；相当于英文中的 Political Tutelage，有政治的教育、指导和监护的意思，亦即海法特（H. Herrfahrbt）所谓的“政治保姆权”。^②

不过，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，在由军权过渡到党权的规划中，却得不到地方军人的信任。北伐后新的党政组织过于忽视不同派系的地位，反而造成党内派系联合地方军人反抗中央的情势不断发生，1929年的“两湖事变”“护党救国军”和1930年的“中原大战”皆是显著的例子。在这些地方实力派军人挑战中央的过程中，冯玉祥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。以1929年的“两湖事变”为例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驻守在河南、山东、陕西一带，就地理位置而论，实为南京中央与桂系胜负的关键。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前后，冯氏与蒋中正曾经亲如手足，但在北伐后逐渐变成视如寇仇；事实上，蒋冯关系的演变，不仅仅只是私人情感的亲疏，也是北伐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具体呈现。是以，本文即欲探讨北伐后蒋冯关系，包括蒋冯由亲而疏到视彼此如寇仇的历程；其次，透过蒋冯关系的演变的历程，来检讨抗战前地方实力派军人不断挑战南京中央的缘由。

有关蒋冯关系的研究，以往已有学者着重于北伐前期的分析，如刘凤翰、王正华等；^③至于北伐后的研究，学者大多着重于地方实力派军人与中央的重大事件之探讨，如编遣会议、两湖事变、中原大战等。^④学界较少以北伐后的蒋冯关系为研究主题，借北伐后蒋冯关系来检讨地方与中央关系者

① 孙中山：《训政之解释》，《国父全集》第3册，近代中国出版社，1989，第219页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《孙中山全集》第5卷，中华书局，1981，第400~401页。

② 陈仪深：《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论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0，第244页；海法特（H. Herrfahrbt）著《孙中山传》，王家鸿译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68，第97页。

③ 刘凤翰：《冯玉祥与北伐》，《中华军史学会会刊》第2期，1997年5月；王正华：《北伐前期的蒋冯关系（民国15年至16年）——以〈蒋中正总统档案〉为中心的考查》，《国史馆学术集刊》第7期，2006年3月，第196页。

④ 刘维开：《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9；陈进金：《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》，“国史馆”，2002；陈进金：《机变巧诈：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》，台北：辅仁大学出版社，2007；曾业英：《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00年第2期，第1~39页。

更少。研究民国史的学者，总是在思考抗战前的中央与地方为何总是处于紧张状态，地方军人为何总是选择以军事行动来对抗中央。本文主要是运用“国史馆”所典藏的《蒋中正总统档案》（以下简称“蒋档”）、《阎锡山档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阎档”）以及《冯玉祥日记》^①等原始文献资料，透过对北伐后的蒋冯关系的分析，来试图回答上述问题。

二 由亲而疏：北伐后的蒋冯关系

冯玉祥，字焕章，安徽巢县人。1896年，冯玉祥正式入营，从一位清军小士兵到民国一个军系的领导者。冯氏皈依基督教并于军中努力宣传，故有“基督将军”（Christian General）的称号。^②1911年武昌革命爆发，冯玉祥参与滦州举事，事败遭禁于海阳镇，后经陆建章协助得以返回保定。^③翌年（1912年）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，令陆建章编练备补军五营。陆氏委派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，赴直隶招兵。陆续来投效者有李鸣钟、张维玺、韩复榘、孙良诚、刘汝明、过之纲、冯治安、孙连仲等，皆为日后“国民军系”的得力干部。^④

1924年9月，北方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，冯玉祥奉曹锟命令督兵热河讨奉，但冯突然于10月19日班师回京。22日，与黄郛密会决定倒曹以组织摄政内阁。23日，冯师占领北京，曹锟随即兵败被囚，史称“首都革命”或“北京政变”。^⑤

① 刘凤翰先生认为《冯玉祥日记》作伪，有些事情故意不记。参阅刘凤翰《冯玉祥与北伐》，《中华军史学会会刊》第2期，1997年5月，第464页。但《日记》不致于全伪，仍可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，可参阅王正华《北伐前期的蒋冯关系（民国15年至16年）——以〈蒋中正总统档案〉为中心的考察》，《国史馆学术集刊》第7期，2006年3月，第196页。

② James E. Sheridan, *Chinese Warlord: The Career of Feng Yu-hsiang* (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6), pp. 52, 283.

③ 影响冯玉祥思想改变，走向革命之路的因素可能有：一是友人孙谏声致赠《嘉定屠城记》和《扬州十日记》二书，让冯氏了解满清入主中国时屠杀汉人之惨状；二是徐世昌被参劾卸任东三省总督，由锡良继任，让冯氏体认到满汉种族的轆轳；三是1909年中日签定安奉铁路协约，日本在华获得修建安奉铁路特权，让冯氏明白清廷的腐败无能。此外，还有朋友、同事间的相互影响，如“武学研究会”等。参阅冯玉祥《我的生活》，第98~104页；James E. Sheridan, *Chinese Warlord: The Career of Feng Yu-hsiang*, pp. 42-44.

④ 李泰棻：《国民军史稿》，沈云龙主编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第66辑，文海出版社，出版年月不详，第63~64页。简又文：《冯玉祥传》上册，第62~63页；高兴亚：《冯玉祥将军》，第10页。

⑤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1册，第631、633页；沈亦云：《亦云回忆》上册，传记文学出版社，1971，第190~195页。

翌年（1925年）4月，国民军在直、奉两军夹击下，由北京撤往西北；之后，冯玉祥经由蒙古前往苏联求援。James E. Sheridan 认为，冯玉祥游历蒙古、苏联，除了提高其政治思想水平、扩大视野外，也让冯氏慎重考虑加入南方的国民党。^① 7月，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。8月，冯玉祥与国民党取得联系。9月，冯氏乃于绥远五原誓师，组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，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。1927年5月1日，冯玉祥在西安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，积极参与北伐战争。^②

事实上，在各地方军事领袖中，冯玉祥与南京国府关系较为密切。从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，蒋中正就和冯玉祥携手合作，取得北伐第一阶段的胜利。蒋冯的关系随着北伐战事的开展由疏而亲，冯玉祥在蒋中正的心目中的分量逐渐加重，而蒋氏要在南京立足，也有赖冯氏的相挺；两人形成战略上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盟友。^③ 1928年2月18日，蒋冯二人接受老将马福祥的建议，在郑州互换兰谱，结为生死兄弟，两人公私情谊更为亲密。^④ 但是，蒋冯的伙伴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。

1928年5月3日，发生了济南惨案。为因应此一情势的演变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绕道北上直取京、津，并由冯玉祥负责总指挥。当时奉张的主力是张学良、杨宇霆所统率的第三、四面军，兵力集中在京汉线。因此，蒋中正把北进的重兵部署于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；19日，蒋中正、冯玉祥等人于郑州商议军事前进方策，决定第一集团军由津浦线北进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由津浦线以西、京汉线以东地区向北推进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北路由京绥线向东推进、南路由正太线向东再转京汉线北进，桂系的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。^⑤ 这样的军事部署，系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负责主力攻击，再配合由两湖而来的桂

① 冯玉祥于1926年3月20日，由平地泉动身，经库伦抵蒙古、苏联访问，于8月17日由莫斯科返国，参阅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155～215页；James E. Sheridan, *Chinese Warlord: The Career of Feng Yu-hsiang*, pp. 195-197.

② 李泰棻：《国民军史稿》，第386～387页。

③ 王正华：《北伐前期的蒋冯关系（民国15年至16年）——以〈蒋中正总统档案〉为中心的考查》，第217页。

④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郑州互换兰谱时，蒋给冯的帖子云：“安危共仗，甘苦同尝，海枯石烂，生死不渝。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。谱弟蒋中正谨订。”而冯写给蒋的帖子为：“结盟真意，是为主义，碎尸万段，在所不计。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。谱兄冯玉祥谨订。”参阅蒋铁生编著《冯玉祥年谱》，齐鲁书社，2003，第84页。

⑤ 王宇高编，周美华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7年4月至7月）》第3册，“国史馆”，2003，第379～381页。

系部队，故冯氏的部队伤亡较重。^①不料，国民革命军攻克京、津后，蒋中正却委任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负责善后。这样的安排让冯氏愤愤不平，冯乃称病赴辉县百泉“休养”，请假不参加蒋中正所邀请之善后会议。简又文在《冯玉祥传》一书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，他说：

先于六月中旬，北平克复以后，蒋总司令发电分邀冯、阎、李三位集团军总司令同到北平举行“善后会议”，冯氏即复电托病不能参加。时，李宗仁在汉口，亟派代表赴豫问病并力劝其参加会议。冯氏感其诚意，答允参加。蒋氏亦派请李担任调处中央与冯氏之隔膜，旋得李复电报告，冯氏已允参加，遂由南京经汉口乘车北上，拟偕同其它三总司令联袂入北平也。不料，蒋氏于七月三日到新乡时，冯氏不来迎，盖已赴道口养病去矣。临走时，瞩秘书黄少谷发电中央请病假。据黄谓其这两天不大高兴，在闹脾气，乃劝其勿发此电。究竟这时冯氏所闹的是什么“脾气”呢？大概是因此次北伐成功，北京克复后，他对于中央酬功颁赏愤愤不平，以为中央把北平、天津两市和察、直两省的政权完全分给晋方，而战功最著、牺牲最大的冯军只分得北平崇文门税局一所，是不公平的，乃怀怨望。想不到这一问题就是以后冯氏与中央发生裂痕的开始。^②

简又文这段叙述，不仅描绘出北伐后冯玉祥怨怼的心情，也充分说明其与中央已经有了裂痕，而对蒋中正有所不满；国民革命军克服京、津后，中央的酬功颁赏不公平，更是让冯氏气愤不已。北伐期间，围攻北京城的第二、三、四集团军中，就属主力攻击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收获最少，其对南京中央的不满，不言而喻。四五个月前（1928年2月），蒋冯才互换兰谱，声称彼此是生死相共的兄弟，却因为北伐后接收京、津问题而有了心结。

除了接收京、津问题之外，对奉军的善后处理，也引发冯玉祥对蒋氏的不满。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政变后，于翌（1925）年4月在直、奉两军夹击下撤往西北，而后前往苏联求援，这是冯氏的奇耻大辱，吴佩孚与张作霖二人更成为冯玉祥生平的两大“寇仇”。吴佩孚兵败后，冯氏以消灭奉军为己任，曾与奉军将领郭松龄签订密约，合力倒奉，却因郭松龄发动讨张政变

① 在郑州举行军事会议前，冯玉祥的部队血战于豫北战场，死伤惨重。参阅冯玉祥《我的生活》第3册，出版者不详，1974，第733～747页；简又文：《冯玉祥传》下册，第312～317页。

② 简又文：《冯玉祥传》下册，第317～318页。

失败被杀而止。^① 国民革命军围攻京、津期间，奉军也是以冯军为主要的攻击目标，而对阎军采取守势；1928年4月，冯军与奉军正在进行豫北血战之际，在保定的街上出现由张学良和杨宇霆会衔的公告，强调对晋阎固须讨伐，而最主要者仍须讨冯，并详述冯之罪状。^② 更有甚者，根据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（J. V. A. MacMurray）的观察，张作霖当时有意跳过冯玉祥而直接与蒋中正、阎锡山谈判妥协。^③ 事实上，济南惨案发生后，国民政府与奉方的谈判交涉几乎从无间断。5月22日，阎锡山电告蒋中正：奉军表示如晋军能和平接收京、津，则可退出关外，一致对外。^④ 蒋中正对此提议担心的是冯玉祥的态度，但仍然表示如果奉方能于一星期内撤出关外，则我军可以不加追击。^⑤ 5月30日，南京国民政府派孔繁蔚、尹扶一和奉军代表邢士廉、葛光庭由上海到北京，与张学良、杨宇霆数次接洽，对国奉合作、奉晋友好以及不追击奉军等问题进行磋商。南京国府的先决条件为：政治上奉军易帜，军事上奉军出关。^⑥ 国府与奉军的多次谈判，蒋氏虽曾知会冯玉祥，但讨论的议题及京、津的善后，冯氏皆无发言权，其内心当然气愤不平。

再者，南京国府将以“政治上易帜，军事上出关”作为对于奉军的处理原则，更让冯玉祥无法苟同：冯氏认为奉军勾结日本帝国主义，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，尤为痛恨。长期以来，奉张与冯玉祥相互仇视，彼此积怨甚深。因此，当1928年6月初冯氏听闻张氏被炸于皇姑屯时，顿时觉得任务已经完了，还因此生了一场重病。^⑦ 冯氏认为奉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，而奉张则认为冯氏有中共和苏联背景；事实上，冯玉祥虽然已经与中共和苏联分道

-
- ① 冯玉祥与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0日签订密约，该密约声明：双方系同志结合，并支持郭松龄改造东三省政府。密约原件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，本文转引自蒋铁生编著《冯玉祥年谱》，第71~72页。
- ② 张友坤、钱进主编《张学良年谱》上册，第271页。
- ③ James E. Sheridan, *Chinese Warlord: The Career of Feng Yu-hsiang*, pp. 238, 348.
- ④ 王宇高编，周美华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7年4月至7月）》第3册，第392~393页。
- ⑤ 王宇高编，周美华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7年4月至7月）》第3册，第396页。
- ⑥ 张友坤、钱进主编《张学良年谱》上册，第279、281页。
- ⑦ 冯玉祥回忆其听闻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后，“忽然病倒了，浑身发烧，咳嗽头痛，上吐下泻，四肢无力。”参阅冯玉祥《我的生活》第3册，第752~753页。不过，冯氏此段回忆时间可能略有出入，因张作霖被炸时，外界并不知其生死，直到6月21日才正式公布其死讯，当时冯氏应无法知晓张作霖已经被炸“死”。参阅张友坤、钱进主编《张学良年谱》上册，第283页。

扬镳，但其“过激派”的形象，一直不为奉张与外人所喜爱，所以在华的许多外国人并不乐见冯氏接收京、津。^①

北伐军攻克京、津后，冯玉祥于6月16日在百泉“休养”期间曾与十位百姓谈话，“百姓告以我国已亡二次，幸经恢复，现在又要亡国，请大家合力救国云云”。冯氏因而赋诗一首，从诗句内容可以理解其时时以民生为念，尤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想法。^②因此，他认为张作霖勾结日本，卖国媚外，甘为日本帝国主义鹰犬，死有余辜；国府则应该除恶务尽，不应放任奉军出关、不予以追击。^③对于出关后的奉军，冯氏也一样不假辞色，1928年7月中旬，张学良派代表洪维国、李文鼎携带亲笔专函入关拜见阎锡山、冯玉祥，结果洪维国见到了阎锡山，但李文鼎却遭到冯玉祥拒绝接见。冯氏并云：“关外事业，由蒋总司令主持办理，本人惟中央命令是从，可不必别有接洽，转多枝节。”^④冯氏对东北军及南京中央的处理态度的不满，仍然溢于言表。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，冯玉祥与南京中央因为接收京、津和对奉军善后等问题，而开始有了裂痕。

另一个让蒋冯关系濒于破裂的是1929年初的国军编遣会议。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，蒋中正即已思考裁兵问题，冀图达成孙中山化兵为工，为国家建设之用的目标。因此，为了解决兵额过多、军费过巨的问题，乃于1929年1月召开国军编遣会议，蒋中正于会中宣示：“编遣会议开幕之时，这就是表示中国的新生命、军人的新生命从兹开始。”^⑤蒋中正认为若财政权与军事权无法国家化、中央化，奢谈国民党训政或国家统一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但在编遣会议之初，蒋中正就曾颇为感叹地记下：“军阀习惯性成，除不胜除，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，思之但有郁闷而已。”^⑥自1月5日至25日，国军编

① James E. Sheridan, *Chinese Warlord: The Career of Feng Yu-hsiang*, p. 238.

② 诗云：“四位商人两位工，同行并有四位农。先问姓名与职业，十人所答各不同。工人便说终日苦，农人又说早得凶，商人便盼交通便，车通买卖自兴隆。为谈异族元清事，惨杀压迫无不至。十人闻之心顿明，咬牙切齿几裂眦。又谈济南五三案，个个痛恨不能置。墙上一幅苍蝇图，只是告与卫生意。他云敌人纪律坏，吃喝嫖赌四字备。并说我军官与兵，割麦灌田助民利，虽然一切琐碎事，有关民情堪一记。从此作事更勤慎，民心如此知所畏。”参阅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472～473页。

③ 冯玉祥：《我的生活》第3册，第752～753页。

④ 张友坤、钱进主编《张学良年谱》上册，第295页。

⑤ 《革命文献》第24辑（合订本）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，1968，第4839～4841页。

⑥ 袁惠常编，吴淑凤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5册，第54页。

遣会议历经六次大会终于通过《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》，准备召开国军编遣实施会议，中国似有实质统一的契机；但是，各地方军事领袖无法开诚布公，对蒋中正与南京中央仍存有疑忌。因此，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闭幕后几天内，李济深、冯玉祥、阎锡山等急欲返回粤、陕、晋根据地，而蒋氏也只能喟叹且无奈地答应他们。^① 李、冯、阎相继离京，正代表着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仍深；彼此互信基础薄弱，是以难免因为些微的摩擦而引发更大的争端。

冯玉祥认为南京中央对于各军的裁汰，是基于势力均衡原则的“齐头式”裁兵方式，这样的方式并不被冯玉祥所认同。冯氏认为裁兵的准则应为：“第一在不收兵，其办法应以强壮者编，老弱者裁；有枪者编，无枪者裁；有训练者编，无训练者裁；有革命功绩者编，无革命功绩者裁。”^② 因此，1929年元月冯氏参加国军编遣会议后，2月5日即以胃疾为由，请假回河南根据地。^③ 同一时间，南京中接获消息指出冯氏的部属在上海积极活动。^④ 这时的蒋冯关系已不若北伐初期的亲密，而第二集团军的种种活动，似已说明情势不甚乐观。

三 形同陌路：两湖事变时的蒋冯关系

1929年1月，蒋中正在南京主持国军编遣会议。2月5日，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，正式展开各项工作。1929年2月，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即将召开，李宗仁深知蒋中正将裁撤各地政治分会，如此桂系在湖南定失凭借；同时，李氏又接获何键密报，蒋氏以军械接济湖南省主席鲁涤平，形势似乎对桂系不利。因此，李宗仁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乃于2月19日决议改组湖南省政府，撤换省主席鲁涤平，以何键继任；同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、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兵由鄂入湘，进占长沙，

① 袁惠常编，吴淑凤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5册，第82~83页。

②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486页。

③ “患胃病”应只是冯氏离京的借口，其返回河南开封后，直到2月底却未再有胃痛病症。参阅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67~582页。

④ 《何参军长致阎锡山庚电》，民国18年2月8日，“国史馆”藏（下同），《阎档·处理西北军事冯氏兴戎案》，档号：1372.42/2116-1-3，微卷第4卷。

迫使鲁氏遁走江西。此一事变史称“湘变”或“两湖事变”。^①

1929年的两湖事变，被视为桂系军人对南京中央统治权威的挑衅，是桂系军人挑战蒋中正的一场战役，虽然其双方的胜负系于战术与谋略的运用。^②不过，其他地方实力派军人的态度，也是影响战局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其中冯玉祥因具军事实力又占地利位置，立刻成为南京中央与桂系拉拢的对象。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驻守在河南、山东、陕西一带，若冯氏与桂系合作，南京必须面对来自平汉线、粤汉线及西北全面的威胁；相反的，若冯氏选择与蒋中正合作，桂系的两湖部队将无法与白崇禧北平地区的部队连成一气，则桂系的势力有被拦腰切断之虞，实有利于南京中央的各个击破。是以，蒋中正由奉化返京后，认为冯玉祥的态度最为关键，积极寻求冯的支持。2月25日，蒋氏立即致电冯玉祥表示：“按照政治分会条例，不容直接改组省政府，任免省政府主席及委员。此事就应如何处置，务望迅赐指示。”^③此文电虽为征询冯玉祥关于处置两湖事变之意见，实则争取冯氏支持南京中央。

在各军事领袖中，冯玉祥原本与南京国府关系较为密切，但此时冯玉祥对于蒋氏亦有所不满，尤其是部队军饷的问题。^④因此，蒋中正乃力谋补救，给予冯较阎锡山第三集团军较多的军饷。^⑤3月初，蒋中正又立即派遣邵力子、马福祥二人赴百泉，以保荐冯为行政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，以进行游说工作。^⑥此外，蒋氏曾多次致电冯玉祥，强调只有彼此共患难才能力挽危局，3月4日蒋给冯两封电文就曾经提到：“时局混沌，革命已至险境，若复隐忍迁就，必误党国。弟已准备牺牲，凡能共患难到底，益感大谊。”^⑦蒋氏多管齐下的努力，终于发挥了效果，3月11日，冯

① 有关两湖事变的分析，可参阅陈进金《机变巧诈：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》。

② 陈进金：《“两湖事变”中蒋介石态度之探讨（1929）》，《国史馆学术集刊》第8期，2006年6月，第45～72页。

③ 袁惠常编，吴淑凤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5册，第141～142页。

④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81页。

⑤ 曾业英：《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00年2期，第18页。

⑥ 袁惠常编，吴淑凤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5册，第169～170页；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603页。

⑦ 《蒋中正致冯玉祥支亥电》，民国18年3月4日，“国史馆”藏，《蒋档·革命文献·统一时期》第2册“湘鄂事变”，编号12、13。

氏致电表明“服从中央之态度”。^① 获得冯氏的支持后，蒋对于解决两湖事变更具信心。因此，当胡宗铎、陶钧等桂系将领发表《铣电》后，蒋立即电告冯氏云：“处置湘变虽经三全大会制止，仍未收效；为维持中央威信计，唯有武力制裁，以我二人通力合作，必能排除万难”。^② 中央在发布讨伐令前夕（3月25日），蒋还是致电冯氏云：“时局日急，患难日长，吾人惟有共负艰巨，平此祸乱，以固党国。”并请冯氏驻郑主持一切。^③

在蒋中正积极联络冯玉祥的同一时间，李宗仁也于3月9日致电白崇禧云：

某（按：指蒋中正）根本消灭我方，两年来捣乱经过，已详电季宽矣。现状武汉欲渡难关，为自卫计必须与冯联络，不必顾虑将来。至兄在平，须与各方敷衍又当别论，但不宜对马（按：指冯）有不好表示，做事以变通为要，不比个人交友，可以求全责备。如我方在长江目前必须联络某师及赣朱，且不宜对汪精卫再加抨击，盖诸事不能概由我占尽便宜也。^④

李宗仁此一《佳电》，已与白崇禧商议如何因应变局，他认为首先要联络冯玉祥；同时，也不宜再对汪兆铭有所抨击，目的在于联合各界力量来对抗蒋。但是，此时冯氏的态度不明，使得桂系在军事上的部署，有了种种的顾虑。^⑤ 李宗仁甚至建议白崇禧驻北平部队，“试以一部乘车回汉，冯如制止，亦可由此决定其态度，则我之部署更易矣。”或是“明白表示请冯氏接

① 曾业英认为蒋中正正在拉拢冯玉祥的过程中充满挫折，直到3月28日冯氏才表示拥蒋。事实上，3月11日蒋即接获冯氏表示拥护中央的电文，3月28日是冯即表示愿意出兵拥蒋讨桂。参阅曾业英《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00年2期，第18页；袁惠常编，吴淑凤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5册，第169-170页。

② 《蒋中正致冯玉祥养电》，民国18年3月22日，“国史馆”藏，《蒋档·革命文献·统一时期》第2册“湘鄂事变”，编号27。

③ 《蒋中正致冯玉祥有电》，民国18年3月25日，《蒋档·革命文献·统一时期》第2册“湘鄂事变”，编号40；袁惠常编，吴淑凤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5册，第141页。

④ 《李宗仁致白崇禧佳电》，民国18年3月9日，《阎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⑤ 《白崇禧致胡宗铎等寒电》，民国18年3月14日，《阎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防北平，我军南下，积极合彼之口吻，或更有效也。”^① 为了联络冯玉祥，白崇禧派其驻北平代表俞星槎等人，与冯玉祥驻北平代表何克之接洽；冯氏曾透过其代表何克之表示：“只要健公有决心，即投袂而起，仍请此间先发。”^② 同一天（3月15日），有一位署名“挺修”者由河南辉县致电白崇禧，冯玉祥支持桂系似有更明确的态度，该电文云：

挺午抵百泉，冯公表示河北情形复杂，难得□□□□。不得已时，我军宜向南移动，最好即由唐山赴塘沽渡河，赴马厂、沧州至德州，我再循河至道口，则安全亦活动矣。并云：若能集结二万人一体行动，他人亦不敢动也；至对于全局之事，亦必与我方共存亡，如长江战事起，渠亦必出兵津浦路上制止后方。但此时宜一面从党的方面，反对者大联合一致攻击中央，亦是一对抗彼方之策也。^③

此外，冯玉祥的代表黄少谷也到上海与李宗仁会面，商议双方合作方案，强调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，须与军事、政治上反蒋一致。李氏致电胡宗铎等人云：“黄少谷决定到百泉报告冯氏，主张双方有力师长署名反对三全大会，或准我方部队经豫回汉，蒋倒必对汪谅解，开三全大会解决一切”。^④ 3月18日，桂系军人已认定冯氏将与其合作倒蒋，胡、陶、夏等人曾明确告诉廖磊：“冯现已辞军政部部长职，决心与我合作，已集中兵力至豫东，并拟以奇兵取金陵。”^⑤ 至此，桂系军人认定冯氏已表明共同合作倒蒋，其联络冯氏工作已初步完成，遂决定积极备战。

在战略上，桂系积极联合冯玉祥，进行第二、四集团军合作，其对于与南京开战时，可免后顾之忧，同时有利于北平部队经豫回汉参与作战。就桂系而言，这是最佳的战略部署。不过，此时的冯玉祥却是采取两面策略，一

① 《李宗仁致白崇禧寒申电》，民国18年3月14日，《阎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② 《俞星槎致白崇禧删子电》，民国18年3月15日，《阎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③ 《挺修致白崇禧删西电》，民国18年3月15日，《阎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④ 《李宗仁致胡宗铎陶钧夏威筱午电》，民国18年3月17日，《阎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⑤ 《夏威胡宗铎陶钧致廖磊皓午电》，民国18年3月18日，《阎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方面致电蒋中正表示“服从中央”^①，另一方面又与李宗仁会商合作方案。^②因此，才让桂系误认冯氏已表明共同合作倒蒋，而决定积极备战。不料，3月26日蒋中正下令讨伐桂系时，28日冯玉祥随即表示可以出兵协助南京中央讨桂，出乎桂系军人的意料。事实上，冯军并无助蒋讨桂之举，只是坐观鹬蚌相争，乘机获渔翁之利而已。^③

1929年3月，冯玉祥虽然通电表示协助中央讨桂，实际上其对于蒋氏早已诸多不满。他曾于1929年2月12日与邓飞黄谈及蒋时，云：“蒋专弄权术，不尚诚意，既联甲以倒乙，复拉丙以图甲，似此办法，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。”^④2月19日，冯氏与陈继淹、黄中汉等人会谈时，对于中央的宣传大纲中，竟然有“打倒破坏统一之桂系军阀”的词句，表示不满。^⑤事实上，就在冯氏与陈继淹、黄中汉等人谈话的当天，湖南已经爆发事变，桂系与蒋氏即将兵戎相向了。

蒋中正急欲解决第四集团军，冯玉祥曾于2月23日的《日记》上云：“目下政府当务之急，只求得民心可耳，徒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。吾恐方灭一秦，又生一仇也。”^⑥26日，冯氏再于《日记》上对蒋氏的施政大肆批评，他说：

一、三全大会代表，多由圈定指派，较之曹锟贿选，尚糟一着。
二、年来日望统一，所以忍所难免，现在将党及主义离开，而为一己一系争权，国家分裂之象，又经形成，同室之戈，一操再操，黄台之瓜，

① 袁惠常编，吴淑凤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5册，第169~170页。

② 《李宗仁致胡宗铎陶钧夏威筱午电》，民国18年3月17日，《閤档·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》，档号：18.0372.42/0032-3，微卷第43卷。

③ 依违两端一向是冯玉祥的行事作风，也是地方实力派军人的自保之道。1925年10月张作霖与孙传芳的奉浙战争中，冯玉祥一面敷衍张作霖，一面敷衍孙传芳，试图坐收渔人之利，因而错过反奉的最佳时机。1925年11月，冯玉祥又私下结合奉系的郭松龄，与之签订奉密约，但在郭松龄倒戈反奉时，趁机攻打郭松龄的盟友李景林，使李氏转而支持张作霖，冯玉祥再次错失倒奉良机。1927年7月宁汉分裂时期，蒋介石亲自率领国民革命军攻打徐州时，曾要求冯玉祥协助制止武汉部队东下，冯氏态度依然依违两端，竟然通电称武汉政权为中央政府。蒋氏对此一通电，非常不满，曾云：“焕章此电，殊失体统，军人岂能执持两端？”参阅孙诒编，王正华编注《蒋中正总统档案：事略稿本（民国18年1月至5月）》第1册，第622页。

④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71页。

⑤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71页。

⑥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78页。

三摘四摘，瞻念国家前途，殊为伤心。三、吾屡代请北伐受伤官兵恤金，当局者辄漠然置之，一钱不名。而北伐后新收各部，却按月三十万、二十万关饷，未免有失不平也。^①

冯玉祥氏甚至当面告诉蒋中立的代表马福祥、邵力子表示：“本军士兵，连年作战，一钱莫名，满冀北伐成功以后，为谋幸福，聊尽心心，孰料今则训政开始，仍是无衣无食，余为领袖，时觉良心不安。又现在许多杂军，皆已编为国军，按月关饷，而方振武等，转战万里，迭着勋劳，反竟无立锥之地，殊属失平，似此措置欠当，恐将不平则鸣。”^②除了批评蒋中立的党政领导外，此时冯氏对蒋最大的不满应该是有关济南惨案的交涉。

国府与日本有关济案的交涉，外界谣传纷纷，有谓国府外交部部长不愿意解决济案，是唯恐山东省将落入第二集团军手中。冯玉祥对此一传言极度不满，认为：“政府果如是，殊不识大体也”。^③另一方面则派何其巩赴山西，与阎锡山洽商解决济案，他同时告诉何氏：“解决济案，一方固凭外交，一方还须预备一种力量作为后盾。今兄弟阅墙，外引其侮，日本焉肯撤兵耶。”^④冯氏对于蒋中正怯于外交，却勇于内斗的行径，颇不以为然，曾当面告诉邵力子云：“唯蒋不憚斂天下之怨，而党权一人独握，纵能战胜桂派，吾恐继之而起者，仍将大有人在，殊令人不无怅怅耳。”^⑤1929年4月，蒋、桂战事正式爆发，而蒋冯关系也已濒临决裂；4月6日，他曾告诉友人说：

蒋氏骄奢淫逸，固不能无过失处，但国内各实力派，除彼以外，尚无有能统率者。故我自五原誓师以后，始则禁止共党在西北作反蒋之宣传，继则苦心调和宁汉，又继则联合阎总司令请其复职，终则首先至南京，力邀各总司令集中首都，真诚合作，即稍有不满意处，亦竭力忍耐以拥护之。……诿伊自编遣会议以来，极端偏私，排除异己，对于三中全会，又复指派圈定，形同贿选，致引起全国之反对。余虽有爱于蒋氏，亦苦不复能相助也。^⑥

①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81页。

②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86页。

③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91页。

④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595页。

⑤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602页。

⑥ 《冯玉祥日记》第2册，第608页。